

戰時小叢刊之二十六

第八路軍的過去與現在

最活躍的抗戰游擊隊

毛澤東等著



戰時出版社出版

戰時小叢刊之二十六

第八路軍的
過去和現在

**最活躍的
抗敵游擊隊**

戰時出版社刊行

目次

紅軍小史	(一)
紅軍的誕生	(一)
從圍剿到長征	(七)
二萬五千里長征記	(一五)
抗戰情緒高漲中的紅區	(三一)
紅軍改編第八路軍的經過	(三五)
第八路軍出動抗日	(四二)
第八路軍上前線去	(四六)
第八路軍大戰平型關	(五三)
第八路軍的勝利與抗戰的光明前途	(六六)
第八路軍的幾個重要人物	(七〇)
史沫特萊談八路軍游擊戰績	(七四)
華北游擊戰爭的展開	(七六)
第八路軍是怎樣戰鬥的	(八三)
史沫特萊再談八路軍游擊戰績	(九〇)

紅軍小史

中國開始有共產黨的組織，是在一九二〇年之際，進展很快，一九二三年國民黨總理孫中山，跟蘇聯代表越飛攜手起來了。不久，國民黨就實行改組，進一步地跟共產黨合作，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國民革命的成功，共產黨的力量是很巨大的。

此後不久，一九二七年國共兩黨突然分裂了，共產主義就成爲了違禁品，信仰共產主義者都被殘殺掉，同時，國民黨軍隊也爆發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叛變，起因也就在這裏。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中國共產黨很迅速地進攻，由贛湘兩處幾十枝後膛槍的威力，一霎時便變成了精兵幾千人光景了，原來這些壯士就是農民；而槍械是從國民黨軍那方面劫奪過來的。一九三〇年，紅軍的勢力越加膨脹了，國民政府就實行第一次的圍剿，此後又接連掀動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圍剿，——不過，結果都不曾有什麼勝利。

第五次圍剿又來了，蔣介石親率大軍九十萬人，直接參加作戰的也多至四十萬人，兵力的雄厚，當然是不消說的。蔣介石是一個戰略很好的人，加上兵餉充足，戰具也新銳，國民黨軍方面，當然佔得了極端的優勢，不過，行軍方面的大缺點是消耗太大，所以打來打去，連打了好幾個月，結果仍然不能給紅軍以重創，然而紅軍根據地是已經被封鎖了，兵力薄弱的紅軍，當然不能衝出重圍。因此，國民政府

得意洋洋，以爲紅軍是已經成了盤中之物，沒法再出動了。

這時候，紅軍方面，自然是感到了自己的處境的危險，於是想出了一條好計策。每當夜深的時候，共產黨員若干人偷偷地進到紅軍的駐在地點，同時，同樣數目的紅軍又從他們的駐在地點偷偷地跑出去，逐漸地，全部紅軍竟已經集中在江西瑞金附近了。這一行動，國民黨軍方面完全是未加防備的，所以一切的原定計劃，都被紅軍破壞無餘了。又過了四個晚上，紅軍已經出動到湘粵兩處，打退了駐防在那些地方的國民黨軍。紅軍自從奪得了這一防線以來，向西南發展的路就可說是打開了。他們不辭堅苦，兼程進軍，更不怕國民黨軍的砲火的進攻和飛機的猛轟。而且，每天至少跟國民黨軍正式接觸一次，凡此種種，一切都滿不在乎的。紅軍苦鬪的精神，實在是歷史上唯一可見的事實，比較當年拿破崙從莫斯科撤兵時的英雄戰蹟，還過之而無不及。紅軍保持着紀律，留存着實力，終於遍歷十省之境，跋涉八千英里，在一九三五年十月間，到達了陝北，跟駐防蘇維埃區（一九三三年成立於陝北的）紅軍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兩支部隊集合了。這一次，紅軍雖是被打敗了，可是政府方面的損失卻更其重大，據說國民黨軍打死一個紅軍，政府須付出代價八萬元之多哩。（Agar Snow 原著，白樺譯）

紅軍的誕生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賀龍和葉挺的部隊，與朱德合作，領導了歷史上有名的「南昌暴動」，並

組成了後來變成紅軍的第一個部隊。星期後，八月七日，黨的中央委員會召集了一次特別會議，能免陳獨秀書記之職。自一九二四年在廣州召開的第三次大會起，我一直是黨的政治部中的人員，並促成了這次決議（罷免陳獨秀）。黨採取了一個新路線，放棄所有合作的希望。開始了長久的公開的爭奪政權的鬥爭。

我被派到長沙去組織一個運動，就是後來叫做「秋收暴動」的。我在那裏的計劃是要實現五點：共產黨省黨部完全與國民黨脫離；組織工農革命軍；沒收大中小地主的財產；脫離國民黨；在湖南建立共產黨政權；組織蘇維埃。當時第五點爲共產國際所反對，直到後來才進展，成爲一個口號。

到了九月，靠了湖南的農民協會，我已經組成一個普遍的暴動，並成立工農軍第一隊。我的部隊有三個主要的來源——農民本身，漢陽的礦工和國民黨中叛變的軍隊。這個早期的革命軍隊叫做「第一工農軍第一師」，是經過省委會的批准後組織起來的，但是湖南委員會和我的部隊的總綱領爲黨中央委員會所反對，不過，它好像只採取一種觀望的政策，並未作切實的反對。

隨着第一師的成立，我成了它的前線黨委會的主席，一個武漢衛戍兵的司令官成了它的司令。不過他多少是因了他部下的態度而不得不就任這個職位的；隨後不久他就棄職加入國民黨。現在他在蔣介石先生手下，供職南京。

這個小小的軍隊，領導着農民暴動，向湘南移動。它衝破了成千成萬的軍隊，作了許多次戰爭，吃

了許多次敗仗。當時的軍紀很壞，政治訓練的水準很低，而官兵中有許多動搖份子。所以「開小差」的人很多。在第一屆司令逃走後，軍隊改組，剩下來的隊伍，約有一團人，換了一個新的司令。後來他也叛變了。但是在最初的團體中有許多人還是忠誠到底，到今天還在紅軍中。當這一小隊人最後爬上金剛山（一個近乎不毛的山寨，以前爲盜匪盤據）時，他們的數目祇有一千左右了。

因爲「秋收暴動」的計劃沒有被中央委員會批准，又因爲部隊受了嚴重的損失，同時從城市的觀點看來，這個運動好像一定要失敗的，現在中央委員會堅決地排斥我了。將我從政治部和前線委員會中革出。湖南的省委會也攻擊我，稱我們爲「規掠運動」。可是我們依然帶着我們的軍隊，留在金剛山上，一面確切覺得我們在執行正確的路線，而以後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了我們的正確，新的兵士添加進來，這一師又補充起來了。我成爲它的司令。

從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秋，第一師以金剛山爲根據地。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最初的蘇維埃成立於茶陵（在江西邊境而屬於湖南省境上），同時第一屆蘇維埃政府也選舉出來。在這個蘇維埃，及以後幾年中，我們依據了遲緩但是有規律的發展，建立了一個民主的綱領，伴隨着一個溫和的政策。這使金剛山備受黨中「盲動主義者」譴責，他們要實施一個恐怖政策，規掠和殺戮地主，並焚燒他們的財產以摧毀他們的胆量。第一師的前線黨委會拒絕採用這種策略，於是被一般盲動者戴上了「改良主義者」的帽子。我備受他們的攻擊，因爲不實行一個更「激烈」的政策。

一九二七年冬，兩個以前盤據井岡山附近的盜魁加入了紅軍。這使我們的力量增加三團左右。這兩個人雖然以前是盜匪，曾率領部下投効國民革命軍，現在更準備與反動勢力鬥爭。當我留在井岡山上的時候，他們始終是忠實的共產主義者，執行黨的一切命令，可是到後來，到他們單獨留在井岡山時，他們又回復了昔日的強盜脾氣，結果被農民殺死。因為那時他們已經組織起來，已經蘇維埃化，能夠保衛自己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來到井岡山，我們的力量合併起來了。我們共同擬了一個計劃，要建立一個六縣的蘇維埃區，我們穩定和加強湘贛粵三省接壤區域的共產黨政權，並以此為根據地逐漸發展到更廣大的區域中去。這種策略與黨中央的辦法相反，他們有着迅速擴展的妄想。在軍隊本身，朱德和我不得不與兩種傾向搏鬥：第一，要想立即進攻長沙，這我們以為是「冒險主義」；第二，要想退到廣東省境之南，這我們以為是「退却主義」。當時我們的見解，以為我們的主要工作有二：平均地權和建立蘇維埃政體。我們要武裝羣衆以加速這種過程。我們的政策要實現自由貿易和善遇被俘的敵軍，一句話，是民主的中庸。

一九二八年秋，一個代表會議在井岡山召開，到會的有井岡山以北的蘇區代表。當時各蘇區的黨員對於上述的政策還存在着幾種不同的意見，在這次會議上，這種異點澈底地表示出來了。一小部份人以爲在這種基礎上，我們的前途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大多數人却信仰這個政策，當決議提出

來，宣布蘇維埃運動一定會勝利的時候，很容易地就通過了。不過黨中央還沒有對這個運動批准，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冬，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在莫斯科召開的決議錄的報告達到井崗山時，才得到批准。

關於在那個會上所採取的新路線，我和朱德是完全同意的。從那時起，黨的領袖和在鄉村中從事蘇維埃運動的領袖間的爭點完全消除，而黨的調和與一致又重新建立起來了。

第六次大會的決議案綜括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經驗，南昌廣州和秋收暴動的經驗，決定應該着重土地革命運動，這時，紅軍開始在中國其他部份出現。賀龍在西面，徐海東在東面，開始建立他們自己的工農紅軍。同時，在一九二七年冬，在鄰近福建的江西省東北境上，也發動了一個運動，後來並由此發展成爲一個強大的蘇維埃根據地。在「廣州暴動」失敗之後，有一些紅軍都跑到海陸豐，並在那裏成立了一個蘇維埃，但因為它信奉盲動主義，很快地就被破壞了。一部份部隊從那個區域裏出來，與朱德和我取得聯絡。

當我們在井崗山上「對冒險主義鬥爭」的時期中，我們擊敗了兩次軍隊奪山的企圖。井崗山證明了是我們所建立的這一種流動部隊的絕好根據地。那裏有很好的天然防禦，並且出產足夠的收成來供給一個小小的部隊。它的周圍有五百里，直徑約八十里。在當地，它的名字是另外一個，叫大小五鎮（真正的井崗山是附近的一個山）。

山上的情況，因來了這樣多的軍隊，變得十分惡劣了。軍隊沒有冬季制服，飲食也極度稀少，有幾個月，我們簡直靠南瓜過日子，士兵們喊出一個他們自己的口號：『打倒資本主義，吃盡南瓜！』——因爲在士兵看來，資本主義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留下彭德懷在井崗山，我和朱德衝破了軍隊的封鎖，一九二九年一月，我們在這個久經戰陣的山上所造的第一個居留地就算是終結了。（毛澤東）

從「圍剿」到長征

現在，紅軍開始在江西一帶作戰，並且順利地迅速發展起來了。我們在銅鼓建立了一個蘇維埃，並和當地的紅軍聯合起來。我們分出軍方，繼續佔領三縣，並建立了蘇維埃。因爲在紅軍到達之先，那裏已經有了武裝的羣衆運動，這樣保證了我們的勝利，並且使我們能在一個穩定的基礎上很快地加強了蘇維埃政權。

紅軍的情況在物質和政治兩方面，都開始有進步了，但其中還有許多惡劣傾向。例如，「游擊主義」就是一個弱點，這反映了訓練的缺乏，民主政治的誇大觀念和組織的鬆懈等等。還有另一個傾向不得不與之搏鬥的，就是「流氓性」——不喜歡在政府的嚴重工作中安身，喜歡變動和新的事變。還有一種是軍閥主義的殘餘，有些長官虐待甚至毆打弟兄，並且隨意反對自己個人所討厭的人，而對其餘的表示好感。

許多這些弱點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閩西的一個會議召開後，都一一克服了。會議討論了各種改進的理想，消除許多誤解並採用新的計劃，這樣奠定了紅軍中崇高的意識領導的基礎。在這以前，這些上面提過的傾向是非常嚴重的，並且爲黨中託派和軍事領袖所利用以削弱這個運動的力量。同時，展開了一個對託派的猛烈鬭爭，有好幾人被剝奪了他們在黨中和軍隊中的官職。我們發現了他們在戰時常領導紅軍陷入艱難的地位，企圖毀壞紅軍；在幾次敗仗以後，他們的計劃是十分明顯了。經驗顯示了他們的錯誤，將他們從負責的職務中革除，並且在這個會議後，它們就失勢了。

福建會議開闢了建立江西蘇維埃政權的道路。次年，贛南全部淪於紅軍手中。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一個重要的地方會議在贛南召開，討論蘇維埃以後的綱領。到會的有黨軍政的地方代表。會中土地政策經過長時間的辯論，而對「機會主義」（爲反對重新分配土地的人所領導）的鬭爭是克服了。大會決議實施土地分配和成立蘇維埃。當時，紅軍只是成立了地方蘇維埃和縣蘇維埃。在大會上，大家決議建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於瑞金。對這個新綱領，農民報以熱烈援助。

漸漸地，紅軍對羣衆的工作進步了，軍紀加嚴而組織羣衆的新技術也在發展起來。早在井岡山時，紅軍已經對戰鬭員訂下了三條簡單的規則，即服從命令，不沒收任何貧農的財產，將一切沒收地主的物品立即交給政府處置。在一九二九年的會議後，對於取得農民幫助的工作異常努力，在上述的三條之外，另加了八條規則：當你離開一個人家，將一切門板（睡覺用）放到原處；歸還你所睡的

草梅並將它捲好；對老百姓要謙和並隨時加以幫助；歸還一切借用的物品；賠償一切損壞的物件；和農民以誠相待；購買一切物品須付錢；講衛生，尤其是在距離人家很遠的地方設立廁所。

這八點的施行，愈來愈見成功，到今天還是紅軍士兵的規律，要他們記憶並時時復誦，另有三種任務要教給紅軍，當作它基本宗旨的：第一，誓死與敵人鬥爭；第二，武裝羣衆；第三，捐錢幫助戰爭。

除開這種運動的政治基礎不算，紅軍的戰術也進步了，這是順利的軍事發展的原因。在井岡山時，我們有四個口號，「敵進我退，」「敵停我擾，」「敵避我攻，」「敵退我追，」都是游擊戰術的主要方法，紅軍就是靠了它發展起來的。這些四個字一條的口號，最初爲許多人所反對，他們不主張採用這種戰術，可是許多經驗證明了它們的正確。凡是紅軍脫離了這種戰術的時候，普通總是失敗的。紅軍的人數很少，較敵人少一二十倍；它的資源和軍需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巧妙地把計策和游擊戰術聯合起來，才有希望戰勝有着廣大富庶根據地的敵人。

紅軍戰術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在攻擊時集中它的主力，而隨後能加以迅速的分散，這就是說，要避免陣地戰，而在運動中要用盡各種方法和敵人的部隊接觸並且擊潰它。根據這種方策，雖然許多有經驗的軍人不贊成，紅軍發展了這種神奇的運動戰，和迅速而有力的「速戰」。

在一般的發展蘇維埃區域，紅軍是偏於一種「波浪式」的發展，而非不平衡的前進，即以「跳躍」獲得的前進，並不鞏固所佔領的土地。這種政策是切乎實際的，正和上述的戰術一樣，是從多年

的集體的軍事政治的經驗而來的。這些戰術受當時中國共產黨書記李立三的嚴厲批判，他說紅軍的方法是一種「新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李立三希望攻擊而不要防禦，前進而不要鞏固後方；對大城市加以驚人的攻擊，伴隨着暴動和極端主義。當時，李立三路線把持了蘇區以外的黨部，勢力很大，並在某種程度上強迫紅軍接受這種路線。

一九二九年秋，紅軍移到贛北，攻擊和佔領了許多城市並擊退敵軍多次。當紅軍距南昌極近時，它突然折回西面進取長沙。在這次進軍中，我們和彭德懷的部隊會合。彭已經佔領過一次長沙，不過終因受強大優勢敵人的包圍而退却。彭是一九二九年四月退出長沙的。此後，即在贛南一帶活動，結果大大地增加了他的軍隊。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與朱德和我會合，並在一個會議後決定他應該在湘贛邊區活動，而朱德和我則移到福建去。一九三〇年六月，我們重新建立了連絡。並開始第二次進攻長沙。我們的軍隊都合併為第一方面軍，以朱德為總司令，我為政治委員，在這種領導下，我們到達了長沙城外。

這時，中國農工革命委員會已經組織起來，我被選為主席。當時紅軍在湖南的勢力很廣大，在江西也差不多。我的名字流傳於湖南農民之間；因為捕獲到我有十萬重賞，不論生死，還有朱德和其他共產黨。我在湘潭的土地，（靠了這些地租，我在大革命時代曾用以組織湖南的農民運動，）現在為政府沒收了。我的妻妹以及我兩個兄弟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兒子都被拘捕起來。我的妻和妹被處決。

其餘的後來都釋放了。

紅軍的威信在農民中大大增高了，而且竟達到我的家鄉湘潭。

不過第二次進攻長沙失敗了。大批援軍開到，城中駐紮了大軍，此外，在九月間，新的軍隊更源源開來攻擊紅軍。在這次圍攻中，只發生了一次主要的戰爭，此役我們消滅對方兩旅。不過，我們並沒有能攻下長沙城，在幾週後，我們就退回江西去了。

這次失敗幫助了我們毀壞李立三路線，並拯救了紅軍，使它沒有向武漢進攻，這是當時李所要求的。當時紅軍的主要工作是招募新兵，開闢新蘇維埃區，尤其是，鞏固整個已經陷落紅軍手中的區域的蘇維埃政權。因為這一類計劃，如進攻長沙等，並非急務，而且含有機會主義的原素。

但李立三將當時紅軍的戰鬥力量和民族政治背景的革命因素估計過高。他深信革命已接近成功，而且不久就可以取得全國的政權。這種信仰更因受了當時的長久而疲竭的內戰的鼓勵，它使前途好像大大地偏護李立三。可是紅軍的意見以為敵人正在準備大舉進攻蘇維埃，只要內戰一停止，而且現在不適於艱險的「盲動主義」的冒險。

在湖南事件之後，紅軍回到江西，尤其是佔領吉安之後，在軍隊中，李立三主義被克服了，李本人的錯誤已經證明，不久他更失去在黨中的勢力（李現在莫斯科「研究」）不過，在李立三主義確定地埋葬以前，在軍隊中有一個很危險的時期。一部份軍隊傾向李的路線，並要求與其他軍隊脫離。

不過，這一部份的指揮員——彭德懷猛烈地與這種傾向搏鬥；並能維持他部下的統一和對高級指揮的忠誠。但有一些紅軍部隊公開叛亂了，並逮捕江西蘇維埃的主席，逮捕許多官吏，並根據李立三路線從政治方面來攻擊我。這件事在富田發生，就叫「富田事變」。富田靠近吉安——當時蘇區的中心，這件事產生了一種激動。許多人，都以爲革命的前途，全要看這次鬭爭的結局如何了。但因了黨部的健全，紅軍部隊的忠誠和農民的擁護，這次叛變很快地就鎮壓下去了。爲首的被捕，其餘叛徒都經繳械消滅。我們的路線重新加強，堅決地鎮壓李立三路線，結果，以後的蘇維埃運動獲得了重大的進展。

現在政府澈底感覺到江西蘇維埃的革命潛力之大了，在一九三〇年底開始對紅軍的第一次的「圍剿」，國軍總共有十萬人，開始包圍蘇區，分五路進犯，當時紅軍共動員兩萬人來對付這些軍隊。靠了巧妙地利用計策戰術，我們衝破了第一次「圍剿」，我相信假若紅軍在這以前沒有能得到以下的三個條件，勝利是不可能的，三個條件是：在集中指揮下的我們力量的鞏固；李立三路線的清算；和黨部對肅清紅軍及蘇區中的「A B 團」及反革命份子的勝利。

休息了祇有四個月，第二次「圍剿」開始了，由現任軍政部長何應欽作最高指揮。他的軍力超過二十萬，分七路進攻蘇區。一時蘇區的情勢好像很危險。因爲蘇維埃政權非常弱小，資源有限，而且國軍的物力幾乎各方面都遠勝蘇區。但紅軍仍就抱定了前次得勝的同一戰略應付這一次進攻，讓

白軍的縱隊深入蘇區後，我們的主力突然集中在國軍第七路，打敗好幾團，並摧毀了它主要的進攻的力量。在我們攻擊以後，馬上接二連三地依次擊敗了第三、第六和第七路。第四路不戰而退，第五路一部份被擊潰。在十四日之內，紅軍作戰七次，行軍八日，以決定的勝利結束這次戰事。隨着六路的潰崩或退却，第一路（蔡廷楷是指揮之一）沒有大打就退了。

三個月後，以三個最有能力的指揮爲輔，蔣先生率領三十萬人作「赤區的最後一次的清剿」。蔣先生企圖以狂風驟雨的方法掃蕩「赤匪」。他開始以每天八十里的行軍進入蘇維埃領土的心臟。這恰恰給予了紅軍所最擅長的戰鬥的條件，以僅有三萬人的主力，靠了一串燦爛的戰略，我們的部隊在五日之前攻擊了五個不同的縱隊。在第一戰，紅軍俘獲許多部隊和大量軍火、大砲和軍需品。到了九月，第三次「圍剿」已經失敗，十月間，蔣先生撤回他的軍隊。

現在，紅軍進入了一個較爲平和及成長的時期，很快地擴展起來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一次蘇維埃大會召開，建立了蘇維埃中央政府，以我爲主席。朱德被選爲紅軍總司令。從一九三二年起一直到長征西北爲止，我個人的時間幾乎全部限於蘇維埃政府的工作，軍事指揮交給朱德和其他人。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圍剿」開始，也許是最艱險的一次。在第一戰，國軍兩師被繳械，兩個師長及三萬人被俘。另一師，當時最精銳的一師，接着被消滅，幾乎全部被繳械，師長重傷。這些接戰證明了戰略有着決定的作用，第四次「圍剿」不久就結束了。

到了第五次——最後一次「圍剿」，蔣先生動員了近百萬的軍隊並採用了一個新的戰略和戰術。在第四次「圍剿」時，蔣已經採用德國顧問的建議開始利用封鎖和碉堡制度，到了五次「圍剿」，他把全部信賴都放在這上面。用他的軍隊來實施嚴密的封鎖和整個地包圍蘇區，他謹慎地推進，一面建造汽車路，碉堡和壕溝，避免主力和紅軍接觸，並且僅僅在碉堡的後面作戰，只是完全在飛機大砲和機關槍的掩護下，作短短的推進。

這時期，我們鑄了兩個大錯。第一，是在一九三三年閏變時未曾與蔡廷楷的軍隊密切聯合。第二，是採取了單純防禦的錯誤戰略，放棄以前用計誘敵的策略。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要想與佔優勢的軍隊作陣地戰，在這方面，無論在技術上或精神上，紅軍都非所長。

因了這些錯誤的結果，和國軍的採用新策略，加以在數量上，技術上遠勝紅軍的軍隊，紅軍不得不於一九三四年，進行改變它在江西的生存條件，因為它很快地在惡化起來了。而當時民族政治的情勢也影響了我們移到西北去活動的決議。

這個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圍剿」開始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大會在蘇維埃首都——瑞金召開，對過去革命所有的成就加以檢討。會中我作一個長報告，並且會中選出了今日蘇維埃中央政府全體人員，如今日存在着的。不久長征的準備開始了，這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着手的，恰在發動第五次「圍剿」一年之後。